

考古遗产是田野考古发掘所获取的所有遗址、遗迹、遗物等物质遗存和田野考古记录资料,同时也包括由此而建立的考古和遗址类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等。中国考古学诞生至今,已走过100余年历程,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披星戴月地开展考古工作,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考古遗产资源。

考古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在活化文化遗产、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自信、丰富历史内涵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保护和利用好考古遗产,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为进一步发挥好考古遗产在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以及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于2021年12月经中国考古学会批准成立,2023年5月在河南郑州召开了成立大会,并成功举办了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研讨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旨在为从事考古遗产保护管理及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从业人员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致力于考古遗址、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管理和研究,提升考古遗产保护管理水平,推动考古遗产的展示利用。

为总结考古遗产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考古遗产保护管理的工作实践,进一步推动考古遗产的保护利用和实践探索,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委会编辑的《考古遗产研究》(第一辑)近日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书由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编著,主任委员孙英民主编,以考古遗址、遗址博物馆、考古出土文物等考古遗产为研究对象,围绕考古遗产的保护、利用、管理、运营、展示、活化等研究领域,收录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分为“理论研究”“实践探索”“科技保护”“活化利用”四个专题,其中包括遗址博物馆理论成果、大遗址保护与实践探索、考古遗址公园的活化利用路径等成果,为考古遗产保护、遗址博物馆发展等提供了参考资料,拟系列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在书中提到,考古遗产在国内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有待进一步解答。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最高纲领,不断深化考古遗产保护利用的理论探索和技术创新,进一步厘清田野考古在考古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的核心定位与关键作用,推动建立完善我国考古遗产保护利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推进考古遗址博物

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青铜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研究古代社会生产生活、历史文化等领域不可或缺的物质。在青铜器的诸多类别中,兵器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青铜兵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存在自名现象,用以说明器物的用途和名称等信息,其内容旁涉语言文字、历史地理、职官制度以及考古器物学等多个方面,加之年代久远导致器物身刻名多见蚀泐漫漶,其研究价值与研究难度俱在。如何准确、科学地定名青铜兵器,不仅关系到对器物本身研究的深度,更影响到对古代社会文化的全面理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欣喜地关注到宫肇南、罗雯茜、张续龙合著的《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以下简称《定名研究》)一书于近期出版,该书以其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两周青铜兵器定名问题的最新成果。

该书乃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字图像集成》和《商周青铜器铭文字图像集成续编》中所收录的626件有自名青铜兵器为研究对象,所作工作涵盖了如下几个方面:

青铜兵器自名情况的梳理和分析。该书全面整理和研究两周青铜兵器自名材料,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和文字学角度的研究,厘清商周时期青铜兵器自名的字形种类、发展源流,并对其进行疏证与研究;同时注意兼顾器物形制方面的联系,在厘清名实关系的基础上对器物属性进行辨别,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研究的欠缺,对于之后青铜兵器的定名具有重要意义和指导作用。

青铜兵器定名格式的总结归纳。该书在对两周青铜兵器定名材料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从内容和格式两方面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分析,从而总结归纳了前人著录青铜器时所采用的定名方法。全面梳理前人研究成果可以更为清楚地掌握兵器定名情况,把握研究发展脉络,了解当前学术发展态势,从而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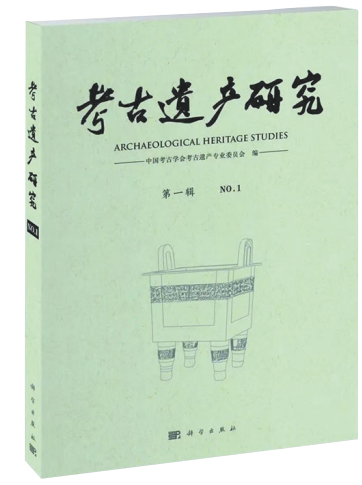
青铜兵器定名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该书结合器物形制和文献记载,对青铜兵器的定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作者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归纳,不断细化原有的兵器定名原则,提出了明确且切实可行的定名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对两周青铜兵器重新定名。

青铜器定名尽管是青铜器研究中的基础课题,但一直以来对其规则、规范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还存在较大的空间。过往受王国维“古器自载其名”说法影响,长期被视为定名第一原则的“名从主人”并不完全适宜于各个时代所有类型的铭文。陈剑先生便指出“名从主人”的原则是“对器物名实关系复杂情况缺乏深刻认识的表现……这条原则彻底贯彻,铜器定名将会变得非常混乱,见名而难知其实。”此外,杜逊松、张懋懿、徐良高、罗卫东、陈英杰等诸先生也都对青铜器定名原则和方法进行过广泛探讨。自名是青铜器定名的首要依据和原则,而由于青铜器本身丰富的文化内涵、器类关系、地域文化、礼制等均对青铜器的命名有重要影响,青铜器的自名称谓情形异常复杂、纷繁多样。《定名研究》迎难而上,全面搜集整理了两周青铜兵器的自名材料,细致梳理了其使用分布情况并总结自名材料中出现的兵器类型。尤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该书积极借鉴前贤研究,融入自身思考,进一步总结提出了定名的基本方法与原则,并以此为指导对两周青铜兵器重新定名,包括器铭为主原则;名从主人、器名类推原则;格式统一原则;器名系列化原则;字形宽严并举原则。通过书中的大量具体实例,我们不难看出,以上原则在保证器物定名简洁准确性的优势和操作实践价值上是格外突出的。

## 考古遗产研究(第一辑)出版

《考古遗产研究》(第一辑)出版

顾万发



物和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在对考古遗址进行严格保护的基础上,建设一批规划合理、策展精良、管理完善的中国特色考古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积极推动重要考古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刘曙光在书中表示,最近十几年来,考古遗址博物馆化展示的方式已成体系。许多博物馆从实际出发,分别对遗迹采取布置标识或原址复建、覆土或覆石、原址建大棚或展厅、重要考古遗迹(地层)搬迁等手段来保护展示,大大提高了遗址的可读性和活力度;在博物馆陈列方面,也更加注意传播语言和叙事方式的创新,展陈结构的调整和视觉体验的丰富,从而大大提高了展览的观赏性和感染力,增强了观众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可以预期,从“十四五”开始,直到2035年,考古遗址博物馆由于处在学科交融的前沿和文化传播的终端,理应在建设与管理、研究与展陈、推广与传播等诸多方面成为排头兵,走在全国博物馆系统繁荣发展的前列,成为中国考古事业和博物馆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and 价值点。

《考古遗产研究》的出版,旨在为学者提供一个交流互鉴的权威学术阵地,与考古遗产、博物馆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热爱考古文博事业的读者们,一同探索考古遗产保护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促进考古资源向社会公共文化资源转变,使考古成果真正惠及社会公众,充分发挥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共同推动中国考古事业的繁荣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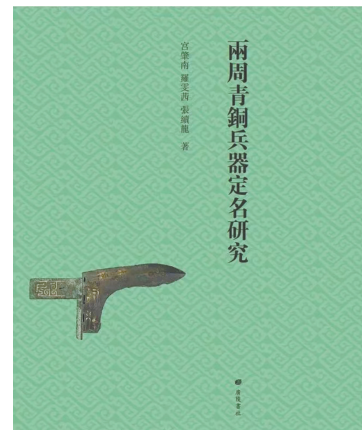
### 《考古遗产研究》(第一辑)

编者:中国考古学会考古遗产专业委员会

主编:孙英民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在研究方法上,《定名研究》一书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入手,对青铜兵器自名用字的各种异体从时代和区域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同时还关注各种写法的使用频次以确定主流字形,并结合形制对自名用字及其修饰语进行了集释和考证。这无疑也对军事制度、兵器使用制度以及兵器形制等关涉领域研究的开展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包括该书在最后还附有《两周青铜兵器自名整理表》,详细列举了两周青铜兵器的编号、器名及铭文字形拓片,这些都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工具属性和学科辐射意义。我们不妨试举一例,以观其实。书中作者整理分析了118件先秦青铜戟自名为戟者,归纳了三大类13种“戟”之字形。其中假借字(“非”)和形声字(包含以“丰”“各”等为声符)两类,为研究“戟”之语源(基本形制)提供了重要参考。结合孟董生先生研究,“丰”声字古音在月、铎两部之间。而铎部的“戟”字在战国兵器铭文中正有从“丰”声,亦有从“各”声者。《说文·丰部》:“格,格也。从丰,各声。”则“格”字为双声符号,丰、各皆声。又《说文·戈部》:“戟,有枝兵也。”据此,“格”和“戟”当为同源词,“格”为树的分枝,而“戟”是有分枝的武器,其语源义正是有分枝之形。

该书对语言文字事实掌握的全面性和问题分析的精到性,显然与其占有资料的立体宏富密切相关。其资料来源既包括了传世、出土古文字材料和历代青铜器著录文献,又包括传世古籍文献和字典辞书等,使得著者可以依托训诂条例和字际关系、音韵通假等,对自名材料从国别、器类、时期等不同维度从容开展细致梳理,还为古文字考释提供了一批新的证据。也正是以上述科学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为基础,《定名研究》得以呈现显著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等特点。

《定名研究》一书通过对两周青铜兵器自名材料的梳理研究,建立了科学合理的分类体系,并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深入探讨青铜兵器的形制,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有效深化对青铜兵器的认识。是书所提出的定名原则,有望推进青铜兵器自名与定名研究及文物定名的规范工作。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冀望青铜兵器的定名问题能够得到长期有效关注,不断丰富和完善青铜兵器定名体系,为更好地理解和研究青铜器文化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 《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

作者:宫肇南 罗雯茜 张续龙

出版社:广陵书社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 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的最新成果

《两周青铜兵器定名研究》评介

游帅

日前,王景荃主编的《河南佛教造像史》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时间为线,石窟造像为面,共收录南北朝至宋石窟造像(包含摩崖造像)63座、单体造像(包含造像碑)107件,且各石窟和单体造像在书中均配有与之相对应的文字信息,包含背景介绍、艺术风格、细节详述、断代依据等;全书配有高清图片338幅,包含实景图、细节图、拓片、线图等等,使学界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河南佛教单体造像的发展情况,有助于推进中国佛教考古与美术史研究进程。

河南地处中原,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兴盛之地。东汉明帝永平七年(64),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醒后询问大臣,大臣傅毅奏道金人应是西方神佛。刘庄于是派遣大臣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同往西域寻求佛法和佛经,蔡、秦等人西行至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境内至中亚一带)遇到了印度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他们邀请二位高僧同来中国,二僧欣然同意。于是一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67)返回国都洛阳,史称“永平求法”。汉明帝将二位高僧安排在负责外交礼宾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第二年又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外三里远的御道之北修建一座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将僧院命名为“白马寺”。这是中国第一座由官方修办的寺院,二位高僧在这里翻译了第一部汉译佛经《四十二章经》。洛阳白马寺由此被中国佛教信徒尊奉为“祖庭”,此后佛教便在中原地区流传广布,辗转八方。

河南佛教造像遗存十分丰富,石窟造像、单体造像、金铜造像遍布全省,璀璨斑斓,异彩纷呈。由于佛教是“以像设教”,雕佛造像和寺院绘画便成为最受欢迎的宣传佛教教义的艺术手段,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造像记录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主编王景荃在本书后记中说,编写一部《河南佛教造像史》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愿望。的确,在此书出版之前,没有学者对河南境内的佛教造像史进行过整合梳理,本书可以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河南历史上佛教造像的艺术表达方式,以及当时的人们如何通过造像这一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本书在对河南各地佛教造像遗存记述的同时,对造像历史背景、形象内涵、艺术特征、社会影响作了研究性的申论,从侧面反映出佛教在我国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对今天研究佛教中国化具有很好的启迪。

佛教石窟造像在佛教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们是艺术和历史的见证。佛教造像融合了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展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技术水平。丰富的艺术形式和精湛的工艺技巧是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起了古代雕塑艺术体系。它们以形象化的方式传达佛教的理念和教义,通过千姿百态的艺术形式,深深烙上了中华民族的印象,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南佛教造像史》网罗式地收录诸多河南佛教单体造像,在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河南佛教造像的分布状况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出发,对造像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表现出的艺术特征进行梳理分析,放进历史的大视野中,既有历史的关照,又有横向的比较,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参考资料。主编王景荃先生现任河南博物院陈列部副主任,

伊犁河谷位于新疆西北,欧亚内陆的中心,自古以来便是沟通欧亚的重要地带。乾隆时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在此地陆续营建驻防城,形成著名的“伊犁九城”,是清朝边疆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始,历史学家通过文献记载,聚焦于伊犁九城的建置沿革和军府制度研究。郝园林副教授基于长期实地调查,首次以考古学视角研究伊犁河谷,著成《西陲屏藩:清代伊犁河谷驻防城的考古学研究》,此书不仅是对清代伊犁河谷地区驻防城体系的全面梳理,更是对中国边疆史地、城市考古学、城市形态学等多个领域的一次深刻探索与反思。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章详细阐述了研究的缘起、概念界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第二章系统梳理了伊犁驻防城的文献史料,回顾了学术研究和考古学研究现状,梳理了城市考古学、城市形态学、“中心地”、边疆理论、“新清史”等理论范式,通过研究伊犁驻防城来检验理论的合理性。第三章依据丰富的文献史料,将伊犁驻防城体系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初建、高潮、完善、战乱、重建,伊犁九城的官军制度也随城址的营建而完善。第四章详细记录了对伊犁九城、牛录城堡、卡伦、营盘等驻防城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作者对这些城址的形制、布局、建筑特色等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和分析,为理解清代伊犁河谷驻防城的布局和形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章通过研究城池形制、城墙形态、构建方式、附属结构,体现伊犁九城的等级性,以伊犁九城、卡伦为代表的统一规则体系和以牛录城堡、营盘为代表的多样体系,二者有机统一构成伊犁驻防体系。第六章聚焦于城市内部,收录大量古地图,详细描述了伊犁驻防城的道路布局 and 建筑特色,伊犁九城和牛录城展现出不同的景象,同时对伊犁九城的外部建筑如关城等进行了描述,进一步丰富了驻防城的整体形象。第七章从文化生态学角度,探讨了伊犁驻防城的选址原则,并从“筑城移民”“军府制”“武器配置”的角度,提出构建“双核”军事驻防体系,而商业的兴起引发“功能转型”,使得核心城市发生转移,但“双核结构”维持下来。第八章结合城市考古学等理论范式,对伊犁驻防城进行了深入反思,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相关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

本书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先浅后深、由表及里,论述伊犁驻防城的设立、考古调查、形制规划、道路建筑、选址功能,为今后城市遗址和城市考古学的论文和书籍的撰写提供一些启示与范式。

该书在史料和考古资料的运用上表现出专业性和系统性。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和考古勘探,结合文献史料、图片资料、卫星影像,对伊犁河谷的驻防城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考证与研究。详尽地描述了这些城址的形制、规划、建筑、道路以及军事防御设施,其中对城内宗教建筑、学校等场所进行了灵活的考证,为研究伊犁驻防城增添人文气息,呈现了一幅清晰而生动的清代边疆驻防体系图景。这种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在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上有了坚实的保障。

对于伊犁驻防城的“式样图”,作者首次发现,并予以整理及刊布。通过清绘,使得驻防城的细节信息得以全面展现,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清代满城、绿营城设计理念、建筑规划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作者还将1901年费德罗夫所绘制的城图予以清绘,并将所

## 评《河南佛教造像史》

高雪薇

主要从事佛教考古、博物馆陈列工作,侧重于古代石刻艺术和佛教美术研究。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足迹走遍全省各地,不间断地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新的考古材料丰富了人们的认识,让过去的一些研究成果有了新的结论。副主编杨超杰和王璐分别为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河南博物院文保中心馆员。优质的编辑团队为本书的学术质量提供了专业保证。

本书作为河南省“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河南佛教造像史研究》的结项成果,经过了多年的田野调查和资料整理,学术功底深、打磨细、收录全。客观地说,《河南佛教造像史》的出版,填补了目前河南佛教造像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对以往的研究也有一种补阙校正的意义。书中根据造像风格判明了数件出土不明作品应为河南派造像,例如书中收录的“张难扬造像”,原存地不详,作者依据该造像形式和造像风格都与“皇甫德像”相近,且张难扬造像铭记中的“下张村”有可能就是辉县东部的“张村”,与“阎闾之造像”的原存地“沿村”(即铭记中的“阎村”)相距很近,且均与新乡相距不远,故推知“张难扬造像”亦应原存辉县张村,有理有据。

河南地区石窟的分布都是以洛阳、安阳这两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古都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有其明显的时代特性和深厚的文化背景;河南佛教单体造像是在石窟造像的影响下开始盛行的,与石窟造像一样,多分布在位于以太行山南麓为中心的豫北地区、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书中也向我们描述了河南派造像鲜明的地方特点,通过对河南石窟造像和石刻造像的整理与研究,向读者反映了自北魏之后佛教在河南的发展及佛教艺术在中原地区的演变。通过对不同时代石窟、石刻造像艺术风格的分析解读,揭示了佛教造像艺术的世俗化和本土化过程。但因河南境内元明清时期的洞窟多以自然山洞为窟,内置造像大多无存或仅存少数,且可移动,无法还原洞窟原状,故本书中对此类石窟造像没有收录。除此以外的河南境内北魏至宋代的石窟造像几乎应尽收,且不乏精美的珍品,为研究古代社会史和宗教史以及艺术史提供了具体真实的形象资料。(作者单位:中州古籍出版社)

### 《河南佛教造像史》

主编:王景荃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8月

## 评《西陲屏藩:清代伊犁河谷驻防城的考古学研究》

刘可心

注俄文名称翻译为中文。这批城图完整地展现了惠远新城的防御体系,伊犁九城各城的城门、角台、马面、护城河等详细尺寸,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书中详细记录了作者对伊犁河谷清代城址的考古调查、测量和勘探过程。这些遗址大多保存不善,但通过实地调查和勘测,结合文物普查资料的整理、卫星图像的汇编,对伊犁驻防城进行了科学研究与测绘,组建了一个有价值的资料数据库,有利于人们考察清代边防立体布局,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相关遗址城墙古建保护课题起到指导作用。

最后,本书在城市考古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也颇为重要。书中创新性地提出伊犁驻防城的布局与形制理念来源于明代北方卫所城,并存在相互呼应的双核布局模式,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清代城市规划的理解,也为城市考古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作者对于“先有城,再住人”的传统筑城观念提出了质疑,并通过伊犁牛录城的实例证明,提出“筑城移民”的新观点,这种观点的提出,无疑是对中国城址研究的一种重要补充和修正。此外,作者还就城市考古学、城市形态学、“中心地”、边疆理论、“新清史”等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反思,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方向。

本书在写作风格上也颇具特色。作者语言平实而生动,既不失学术的严谨性,又富有文学的感染力。他善于将复杂的考古数据和历史事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使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启示。作者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学者,更是一位有情怀的书写者。他通过对伊犁驻防城体系的深入挖掘,不仅揭示了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更表达了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总之,本书是一部集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佳作。它不仅为我们揭示了清代伊犁河谷驻防城体系的真实面貌,更为我们提供了思考边疆史地、城市考古学等新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思路。相信这本书将会成为相关领域学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之作,也将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发挥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作者单位: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

### 《西陲屏藩:清代伊犁河谷驻防城的考古学研究》

作者:郝园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2月